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5.002

论毛泽东“中国化”概念的认识论意蕴

徐艳红,曾祥云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毛泽东首倡“中国化”,并对为什么要“中国化”及如何“中国化”等做了具体阐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具体化”这一认识论概念,并以其替代“中国化”这一政治性表达。因此,在他那里,“中国化”即“具体化”,二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从认识论看,“中国化”涉及的是理论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具体化这一认识中介环节,它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性认识具体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的过程,也即我党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对“中国化”认识论意涵的揭示,不仅深度阐明了“中国化”的本质,也为我国“中国化”研究或党的理论创新研究,指明了进一步思考的认识论维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化;具体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5-0010-07

不言而喻,作为我党倡导并坚守的基本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表达。也正因为此,我国研究者对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性解读。无疑,“结合说”仍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从认识论看,“结合说”主要侧重于从实现方式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对于把握“中国化”本质和阐明“中国化”命题的科学性具有一定启迪,但仍需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实际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不仅有首倡之功,而且在理论探究上也有开拓之力。在“中国化”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毛泽东有较深入的思考与较系统的阐述,并形成了其独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体系。而其中最为精辟、精彩且对当前我国“中国化”研究最富指导意义的,则是他对于“中国化”认识论意涵的深度揭示。毛泽东虽然没有给出“中国化”的明确界说,但他通过对“中国化”本质、成因及实现方式的具体分析与阐发,充分彰显了其对“中国化”认识论本质的深刻理解与根本性把握。

一 毛泽东对“中国化”成因分析的认识论立场

开展“中国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这也是关于“中国化”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对它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中国化”,主要是针对王明教条主义。但这种对“中国化”发生原因的政治性解读,无法对如下历史事实给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早在1931年即王明路线居于党内领导地位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已经开始了对于“中国化”问题的探索。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等,是公认的“中国化”理论成果;而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中,他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①。客观说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及其带给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只是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一个偶然历史事件,并不具普遍性。因此,仅仅从反对和批判教条主义这一政治层面,是难以阐明“中国化”的合理性的。实

收稿日期:2022-06-1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1ZDBM05);湖南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9B503)

作者简介:徐艳红(1983—),女,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际上,“中国化”虽是党的一种政治主张,但它是一个基于认识论的科学命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我党对于一个科学认识论命题的一种政治性表达。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囿于政治层面的解读,就无法揭示、甚至遮蔽乃至消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真理性。

毛泽东在倡导“中国化”这一思想原则时,就已经阐明了其何以发生的依据和理由。首先,他认为,“中国化”缘生于我党领导的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虽具普适性,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①,则各国有所区别。比如,武装夺取政权无疑是对的,但就各国执行它的具体表现来说,则会“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②。在他看来,“中国化”是在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过程中生发的,它与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密切相关,因此,离开中国革命谈论“中国化”,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要准确把握“中国化”的本质、要义,也就必须从中国实践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其次,毛泽东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中国化”的固有之义。他明确指出,“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③,并且“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④。在他看来,“中国化”并不是排斥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及指导作用,相反,它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为前提的。正因为这些原理原则具有真理性与普适性,才为其“中国化”提供了可能。国内有研究者认为,我党之所以倡导“中国化”,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科学理论,它不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这种解读也是站不住脚的,它不仅直接否定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且明显同毛泽东对“中国化”及其成因的理解相悖离。再次,毛泽东认为,在各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必然有其“表现形式”。他指出:各国所遵循的革命原则是一样的,但在各国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⑤。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虽具有普适性,但因各国实现这些原理原则的具体实践条

件即实际情况并不相同,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实践中必有其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俄国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也是如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已很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是不能直接用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关于革命的“一般规律”“总结论”,它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或现成方案,而“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⑥。在他看来,一方面,有关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形式、路径、手段等基本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所固有的内在规定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赋予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定性,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形式、路径、手段等具体实际问题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则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关于中国革命究竟革谁的命、谁来革命、如何革命、谁来领导革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给出出现成的具体结论,而必须、也只能由我党去给予具体阐明,并且这是“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⑦。因此,他说:“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⑧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详细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实际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中的“表现形式”或者说行动方针、具体政策,并以此去指导中国革命。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化”的成因虽有多种解读,但鲜见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性要求方面做出分析探讨。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中国化,是因为它不能直接用以具体指导中国实践。这实际上涉及“中国化”的一个初始性、根本性问题,关系到对“中国化”本质及诸多“中国化”理论问题的理解与把握。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用以具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34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体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做出直接表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来说,为避免共产国际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我党产生不必要的政治猜疑,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慎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他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替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表达,并无不当之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可看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用以指导中国实践这一问题,他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与判断的,并且,他的认识与判断,是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从简单的逻辑推断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即预设了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用以指导实践活动这个前提,否则,它就变成了一个假命题、伪命题。因此,承认“中国化”主张的合理性,也就必须承认上述预设。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活动,它才需要中国化。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能够直接指导中国实践活动,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应当看到,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指导中国实践活动,并没有否定或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因为,说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指导中国实践活动,并不意味着“不用”或“不能用”,相反,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并且它也是“中国化”的固有之义,否则,“中国化”同样无从谈起。毛泽东强调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必须是“创造性的”应用,决不能“教条式的”照搬照抄。另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活动,是有客观根据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它实际是所有基础科学理论走向现实实践所必然发生的正常认识现象。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作为认识第一次飞跃所取得的理性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以高度抽象性为特征的,它提供的是一种事实性认识。而当马克思主义进入第二次飞跃即认识回到实践的认识阶段,它所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中国实践概念,而是鲜活、生动、可感

的我党领导开展的从中国革命、建设到改革的现实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是以具体性为基本特征的,不仅其“主客体是具体的”,而且“实践活动的路径、手段与方式是具体的”^②。现实实践的这些具体内容与要求,在以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基础科学理论中,通常是不会被直接涉及或论及的。换言之,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基础科学理论,由于它们所提供的是关于事物“是什么”“是怎样”的普遍性、事实性认识,并不是现实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做什么”“怎样做”的具体性、应用性认识,因而它们都是不能直接指导实践活动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③,在实际应用中,各国需要做具体分析。因此,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虽是我党领导开展中国实践的客观依据,但它不能直接地、具体地指导我党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因为它不能满足、也不符合中国实践活动对于具体性的内在要求。对于现实实践活动来说,“它直接地服从于和受制于主体所给予的具体的行动指令”^④,因此,对于基础科学理论来说,它必须经由具体主体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指令,才能对实践活动发挥具体的指导功能。也就是说,“理性认识、科学理论一般要经过中间转化环节,才能运用于实践活动”^⑤。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也同样要经由理论具体化这一认识中介,否则,它就无法发挥和实现对于中国实践的指导功能。可见,毛泽东对“中国化”发生原因的理解与认识,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关于科学理论应用的基本原则,是根本一致的;毛泽东“中国化”思想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活动这一预设的逻辑前提,也并非是无稽之谈,而是实质性存在的。

二 毛泽东对“中国化”实现方式的认识论阐明

毛泽东指出:“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⑥显然,这里所谓“创造些新的东西”,从毛泽东的语境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曾祥云:《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认识逻辑》,《湖湘论坛》2020年第6期。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④欧阳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⑤王永昌:《实践观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说,就是创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他说的“具体政策”“理论和策略”“策略路线”等。在他看来,“中国化”的根本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力量、途径、手段等,“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①,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②。

那么,怎样进行这种理论创造呢?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也有明确的阐发。一方面,他认为要按照俄国革命成功的基本思路去做。他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并用它成功指导了俄国革命,“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③。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④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创建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根本途径与主要方式。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⑤,这就是“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⑥。毛泽东不仅大力倡导和积极践行调查研究,而且从学理上对调查研究做了详尽的阐明。

毛泽东认为,人们要认识事物,除了深入事物所处之环境,别无他法。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胜利主要靠斗争策略的正确,而正确的斗争策略源于社会调查,没有调查,就不能掌握真实情况,也就不能提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为掌握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毛泽东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目的是“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⑦。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进行社会调查,才能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真实境况,才能寻求到正确制定中国革命斗争策略的现实依据。

毛泽东认为,仅仅占有材料是不够的,调查研究不是各种事物现象的罗列和各种感性材料的堆积,它必须在获取感性材料基础上,再“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他明确指出,要认识具体的人和事,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⑧。他说,“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⑨。他指出:“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⑩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就是这样写成的。因此,在毛泽东那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中国具体实际,不是陈词滥调,不是做八股文章,而是在通过社会调查获取感性材料基础上,对每一问题“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⑪。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社会调查既是调查研究的第一个认识环节,也是属于人的感性认识阶段;分析与综合分别是调查研究的第二、第三个认识环节,它们都是人们运用的基本思维方法,因而同属于人的理性认识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中,除了认识主体即中国共产党、认识客体即中国具体实际这两个认识要素之外,还内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要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并且,作为一种理论观念,它始终贯穿于调查研究的全过程。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具,“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⑫。因此,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作为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点和出发点而发挥其引领、指导作用的,即使是在社会调查阶段也是如此。从认识论看,“中国化”是以中国实践需要为指向与依据的,因此,社会调查不是盲目开展的,而是有其现实针对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0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14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性与选择性的,即根据中国实践的具体需要而选择具体调查对象、确定具体调查内容的。近代中国社会何其复杂,要了解什么、调查什么,必须是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而展开的,而中国革命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又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为客观依据与思想引领的。毛泽东之所以要调查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倾向等,即是为了具体解决革谁的命、谁来革命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革命首要问题,又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的内在规定性。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引领,毛泽东的阶级调查和阶级分析就无从展开。可见,调查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为根本依据和研究出发点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调查研究,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毛泽东的认知中,“中国化”过程即调查研究过程,也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过程,自然它也是我党实现理论创新、形成与创建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过程,它们是对同一认识过程的不同语言表达。

不难理解,毛泽东阐明的调查研究过程,用认识论话语来表述,就是理论具体化的过程,它是属于理性认识回归实践过程中的一个认识中介环节。显然,毛泽东所阐明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从认识的思维进程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化”实现过程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我党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具体转化为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这种理解是符合认识与实践运动规律的。我党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首先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获得对近代中国实际的具体认识,并以此作为正确制定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现实依据。毛泽东语境的调查研究过程,是我党形成与创建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认识过程,它同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以追求事物客观真实性的认识活动是有很区别的,它是一种以中国实践活动为指向、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一体化的主体认识活动,是“认识世界和观念地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①。因此,从认识论看,毛泽东语境的调查研究过程,也就是我党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过程,即我党将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本质等“是什么”“是怎样”的事实性认识,转化为中国革命所需要

的“做什么”“怎样做”的具体性、应用性认识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理性抽象向理性具体转化的认识发展过程。因此,我党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单推及中国,而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向着真实性和具体性这两个方面的丰富和发展”^②。我党通过调查研究而形成的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是以中国革命为指向、以对近代中国实际的认识为现实依据的,但它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依据、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并且我党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认识要素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一方面,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在内容上更接近客观对象,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另一方面,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与形式上在朝向中国革命要求方面的发展,并被我党赋予了一种强烈的实践意识,从而能够直接地具体指导与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因此,调查研究或“结合”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将诸认识要素进行相加或对比,而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认识过程。正因为此,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直到全面抗战时期,我党“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③。

三 毛泽东对“中国化”本质的认识论阐释

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深度揭示了“中国化”本质的认识论意涵,并且在认识上也明显表现出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这里,仅从三个方面作简要说明。

首先,在表述上,从“中国化”到“具体化”。毛泽东论著中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替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的用语。但是,从“中国化”到“具体化”,并非单纯的语言表述问题,而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化”本质意蕴的理解与把握。简言之,毛泽东理解的“中国化”即“具体化”。

正如上文所讲到,毛泽东弃用“中国化”一词,乃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环境的权衡而慎重为之。

①王永昌:《实践观念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②欧阳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既如此,他以“具体化”一词来替代“中国化”,也自然是经过反复的深入思考而用之,而不可能随意选择一个语词以代之。换言之,毛泽东在替换语言表达方式时,不可能改变其固有的对“中国化”的认知,而必定要慎重选择一个既不致引起不必要政治纷争、又能从根本上反映与体现其“中国化”认知的用词。因此,以“具体化”替换“中国化”,虽有毛泽东的政治考量,但这恰恰使其所理解的“中国化”本质,得到了根本性的彰显,从而使“中国化”这一政治性表达,转换成了一种学理性表达。

诚然,毛泽东并没有对“具体化”给出具体解释或说明,但从其一系列相关论述中,他对“具体化”实际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必须将它“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①,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②。如何去“结合”去“创造”呢?自然是调查研究,“具体化”是通过“结合”即调查研究的方式来实现的。毛泽东语境的“具体化”,就是指我党通过调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或者说“理论和策略”。因此,“结合”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形成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过程,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认识论所说的理论具体化过程。因此,毛泽东以“具体化”一词替代“中国化”,并不仅是一个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表达问题,而是他对于“中国化”本质的认识论表达。

其次,在认识上,从“具体政策”到“中国革命的图样”。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文献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即我党通过调查研究创造的新理论——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多称之为“具体政策”,或“理论和策略”等,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对“表现形式”的认识与表述,越来越接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认为,当人们获得事物的正确认识之后,如果要进而改造事物,就要“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③。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理论

具体化的理解与表述,它同认识论的论述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是在用语上有所不同而已。他甚至引用了《资本论》中关于“人比蜜蜂高明”的那段话,而这段话是马克思用以阐释实践观念的。他认为,开展中国革命,“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④。这里的“图样”,就是认识论中的实践观念。后来,毛泽东又指出,人民大会堂在开始建造之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⑤。在他看来,人民大会堂虽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理论的智慧结晶,但它并不是直接根据科学理论建造的,而是通过将科学理论具体化,转化为一种“设计的蓝图”,才据此建造起来的。从认识论看,理论具体化过程也即主体创设实践观念过程;我党通过调查研究而形成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过程,也就是我党“规定行动方针”和制定“中国革命的图样”的过程。所谓实践观念,通常是指人们对实现特定实践目标及其过程的一种观念性预设。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那里,虽对“实践观念”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表述,但他们的认识和理解是根本一致的。在毛泽东的论著中,用来描述和表达实践观念的用语也是非常丰富与灵活的,但其思想实质同认识论并无区别,如“行动方针”“具体政策”“图样”“蓝图”等,都是对实践观念的语言表达。他在《实践论》指出,人们要改变某一事物,就要形成相应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⑥,并以其具体指导对该事物的改造。显然,形成相应“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的过程,即是创建相应实践观念的过程,也就是形成“做什么”“怎样做”的应用性认识过程。可见,毛泽东完全是基于认识论来把握“中国化”的,换言之,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其理解“中国化”提供了客观依据与理论支撑。

再次,在对教条主义批判上,从政治性批判走向方法论批判。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教条”,他们只有抽象的原理原则,而不了解、也不去研究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情况,不提出、也提不出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毛泽东对教条主义错误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路线的批判,并不限于政治性层面。他不仅强调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①,还写了《实践论》来揭批教条主义。在他看来,教条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认识规律,不懂得从中国革命的现实条件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看,毛泽东的“中国化”主张,恰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与排斥,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才能真正理解教条主义错误的本质与根源。因此,毛泽东的“中国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化”或“个性化”,其本质意涵是“具体化”。这是毛泽东基于认识论而对于“中国化”的根本性把握。

四 结语

毛泽东的“中国化”虽不是一种严谨的学理性表述,但就其表征的原初本义与思想实质来说,却是对于一个认识论问题的中国式表达,它涉及的是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过程中主体的认识发展问题。从认识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我党

将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事实性认识,具体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的过程。毛泽东的“中国化”,不论从其生发与实现来看,还是从其内在规定性来说,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认识论概念。毛泽东对于“中国化”认识论本质的深度揭示,无疑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指导意义,它对于我国“中国化”研究或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从政治性、经验性层面走向更深入的学理研究层面,指明了正确的思考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它深刻地启示我们,“中国化”原本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认识论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回到毛泽东、回归“中国化”固有的认识论本质,才能深度揭示“中国化”发生发展的认识机制与规律,才能科学地阐明实现“中国化”的完整的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才是真正开启“中国化”理论研究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这是毛泽东“中国化”概念给予我们最深刻、也最重要的经验与启迪。

On the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Mao Zedong's “Sinicization” Concept

XU Yan-hong & ZENG Xiang-y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first advocated “sinicization”, and elaborated on why and how to do “sinicization”. Mao Zedo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epistemological concept of “concretization” and used it to replace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sinicization”. Therefore, in his eyes, “sinicization” means “concretization”, and the two express the same concept.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point of view, “sinicization” involves the intermediary link of theoretical re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realization. It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our Party transforms Marxist factu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knowledge required by Chinese practice, that is, the cognition process of our Party to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ao Zedong’s revelatio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meaning of “sinicization” not only clarifies the essence of “sinicization” in depth,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 of further thinking and provides extremely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y of “sinicization” in China 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Party.

Key words: Mao Zedong; sinicization; concretization; Marxist epistemology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